

中国社会学
经典文库

美好社会与美美与共

费孝通对现时代的思考

费孝通 著 麻国庆 编

中国社会学
经典文库

美好社会与美美与共

费孝通对现时代的思考

费孝通 著 麻国庆 编

Copyright © 2019 by Life Bookstore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好社会与美美与共：费孝通对现时代的思考 / 费孝通著；麻

国庆编．—北京：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9.1

ISBN 978-7-80768-252-3

I . ①美… II . ①费… ②麻… III . ①社会学 IV .

① 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41703 号

丛书策划 杨震林

责任编辑 肖 严

装帧设计 罗 洪

责任印制 常宁强

出版发行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31.625

字 数 435 千字

印 数 0,001-8,000 册

定 价 59.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52612；邮购查询：010-84010542)

目 录

一 城乡协调发展

三访江村	3
江村 50 年	19
重访云南三村	33
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	47
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	57
三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	75
小城镇，大问题	85
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	123
农村、小城镇、区域发展	139

二 民族与社会发展

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	163
深入进行民族调查	187
瑶山调查 50 年	197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207
对民族地区发展的思考	241
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	251
民族生存与发展	267
关于中国民族基因的研究	275

三 全球化与文化自觉

人文价值再思考	283
对“美好社会”的思考	301
反思·对话·文化自觉	307
文化论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再认识	323
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	331
创建一个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	347

四 学术反思与展望

迈向人民的人类学	363
重读《江村经济·序言》	375
《云南三村》序	409
读马老师遗著《文化动态论》书后	417
个人·群体·社会	441
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	463
人的研究在中国	489
编者后记	499

一 城 乡 协 调 发 展



三访江村

——英国皇家人类学会

1981 年赫胥黎纪念演讲

从青年时代踏进这门学科，我就已经向往的荣誉，经过了半个世纪坎坷的道路，到了垂暮之年，突然落到自己身上的时候，“欣慰愧赧”可能是形容此时内心感受最恰当的语词。去年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通知我，要我在今年冬季到伦敦来接受赫胥黎纪念奖章是完全出乎我意料的。古人云，“人贵有自知之明”。以我学术上的成就来说，我决不敢妄想和从这个世纪开始时起接受这奖章的任何一位著名学者相提并论。但是我一想到这个光荣榜上开始列入中国人的姓名时，我感到衷心喜悦。这个开始表明了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的学者们是怎样重视这门学科，今后的发展将有赖于全世界各国、各民族学者们的共同努力。我在这个体会的驱策下，欣然就道，来到我的母校伦敦经济学院，经过了 35 年，再一次站到这个讲台上，虽然使我不胜遗憾的是已经不能再见到主持我那次大学演讲的汤乃教

授 (R. H. Tawney) 了。

提到汤姆斯·赫胥黎 (Thomas H. Huxley), 这是我们中国知识界熟悉的名字。早在 1895 年, 我出生前的 15 年, 他的名著《进化与伦理》(*Evolution and Ethics*) 已经由英国朴茨茅斯海军学校毕业的中国清代学者严复用当时优美的古文翻译出版, 书名《天演论》。1976 年, 又由人改译成当前通行的白话文的版本行世。到今天来说, 在中国至少已经有四代人受到这位英国学者的影响了。为纪念他而设的讲座名单上列入中国人的姓名, 可以认为是对这位人类学的先驱者在全世界人民思想上所起的促进作用的历史肯定。荣誉属于这位先哲本人。

坦率地说, 使我发愁的倒是我自己能在这个庄严的讲台上讲些什么来报答同人们对我这样殷切的期待? 在这里我不能不感谢今天在座的我的老师雷蒙德·费思爵士 (Sir Raymond Firth), 他在今年 6 月里, 遥感到我的困难, 伸出了援引的双手。他来信说: “我看到你还没有决定在你的赫胥黎演讲里将对我们说些什么……在我心中涌现的各种意见中, 有一种也许更突出一些的是讲讲你对开弦弓村 1938 年以来所发生的变化的看法。”开弦弓村是我在 1936 年调查过的一个靠近我出生地江苏吴江县的村子, 想用它来代表这一类型的农村, 我给它一个“学名”叫“江村”。后来我到这个学校来上学, 就在马林诺斯基教授 (B. Malinowski) 的指导下, 根据这个农村的调查材料写成论文, 1938 年出版, 书名 *Peasant Life in China*, 中文称《江村经济》。

在我收到这位老师的来信之前, 我早已有意想在我的余生中写一本书, 叙述这个农村的新面貌。今年 10 月我有机会偕同我在上述书中提到的那位姊姊, 现在已经 78 岁, 一起去开弦弓村走了一趟, 当然说不上什么实地调查, 事实上只可以说是回乡探亲。乡亲们热情是难于形容的。我完全沉浸在友谊的海洋里。这种感情的余波, 也使我忘记了今天我是在一个学术的讲座上。我恳求你们的宽容, 让我讲一些只适合于朋友间茶余酒后的谈话, 为大家摆一摆这个已

经为西方学者熟悉的开弦弓村半个世纪来的变化、当前的问题和今后的前景。

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教授在生前曾告诫进行微型调查的人类学者，不要以局部概论全体，或是满足于历史的切片，不求来龙去脉。所以我必须首先指出，开弦弓村只是中国几十万个村庄中的一个。它是中国的村庄，所以它具有和其他几十万个村庄的共同性，它是几十万个中国村庄中的一个，所以它同时具有和其他村庄不同的特殊性。我认为只要把它在中国农村中所具的共性和个性实事求是地讲清楚，也就可以避免弗里德曼所指出的错误了。

开弦弓村处于苏杭之间，太湖之滨。古语有言“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指出了在经济上这是中国的一个富饶地区。不仅因土地肥沃，水源充足，农产较高，而且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副业和手工业也较为发达。这个特点已有很长的历史，一直维持至今，按1979年全国抽样调查了70万个生产大队，该年个人平均年收入不到100元，而开弦弓村所在的苏州地区1980年个人平均年收入已超过250元。这个地区在经济上占先的地位是明显的。开弦弓村在苏州地区却处于中级，个人平均年收入是300元。略高于这个地区的平均数。我们抓这个在全国居上游，上游中又居中级的农村进行解剖，就可以和比它好的和比它坏的农村相比较，从而看到当前中国农村经济正在怎样变化，要致富上升应采取什么道路。

用开弦弓村作为一个观察中国农村变化的小窗口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有近50年的比较资料。我本人在1936年夏季搜集过一些基本资料已如上述。1955年5月，现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任教的威廉·格迪斯（W. R. Geddes）教授访问过这个农村，1963年出版了 *Peasant Life in Communist China*（《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生活》）一本专刊。我本人在1957年夏季又去重访江村。这次调查的资料在过去动乱时期中已经散失，正在访求中。今年9月，美国马里兰州立大学的南希·冈萨雷斯（Nancie Gonzalez）教授访问了这个农村。

我本来打算同她一起去的，因病延期到10月才去成。我们的访问时间虽短，但还是搜集了一些基本资料。

开弦弓村在这近半个世纪中所经历的道路基本上是和中国的其他农村一致的，但是也有它的特点。我离开这村子两年后，1938年日本侵略军占领了这个地区。我在1936年说当时中国的农民问题是个饥饿的问题，在经济方面如果确是如此的话，从1936年到1949年农民的生活不但没有改善，而且更为贫困了。当时全村的土地已有56.5%被地主所占有，75%的人家靠租田和借高利贷过日子。水利无人关心，太湖洪水一发，这些滨湖地区立即受灾。农田的粮食产量逐年下降，亩产稻谷大约只有300斤，蚕丝副业几乎停顿。加上苛捐杂税，盗贼横行，真是民不聊生。造成这悲惨局面的根本缘由，我在上述书中归结于土地制度和维持这种制度的政治权力。正如格迪斯教授书中所叙述的，1949年的解放，改变了政治权力的性质，1951年的土地改革改变了土地私有制，农民真正成了自己土地的主人，从此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必须在这里指出，中国人民能取得政治权力和改变土地制度，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的。

土地改革后，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积极性空前高涨。若以土改完成后的1952年和1949年相比，全国平均粮食生产增长了42.8%，农民购买力提高了一倍。以开弦弓村来说，1936年的粮食亩产量是300斤，1952年据格迪斯教授的数字是500斤，增加了67%。如格迪斯教授所记下的，这个村子完成了合作化后，粮食产量继续上升，到1955年已达亩产560斤。1956年就是合作化后一年，当时农民给格迪斯教授的预算是该年亩产量将达715.6斤，那就是比合作化前的1955年增加28%，比1952年增加43%。这年全国粮食产量比1952年只增加20%，像现在一样，开弦弓村当时在全国范围内是属于上游的。

1958年，开弦弓村像中国的其他许多农村一样建立了人民公社。现在看来这是过早的措施，加上当时在生产上提出了过高的指

标，经济上搞平调，挫伤了社员的积极性，使生产受到挫折，粮食反而减产，社员收入减少。到1960年加上了若干其他原因，全国陷入困难时期。在最严重的时刻，像开弦弓村这样的农村也发生了人口外流的情况。但是在开弦弓村这种情况扭转得比较快，1962年已经纠正了一些过左的措施，规定了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实行了计件工分制。同时还开展了农田基本建设：平整土地，开通沟渠，又推广机电排灌，基本上消灭了我在上述书中所描写的那种用人力踏水车的传统方法。从1962年到1966年，全国大动乱开始前的4年中，开弦弓村粮食产量平均递增率是8.25%，又因恢复和发展了蚕桑生产的传统副业，个人年平均收入在1966年达到119元。社员们至今把1962年作为生活进入富裕的转折点，他们用最简单的话来表达说：“从那年起我们每天吃三顿干饭。”“三顿干饭”是说一个壮劳动力一天要吃两斤粮食。

1966年到1976年，这个全国大动乱时期，农村经济受到的破坏看来并没有城市里所受的那样严重。但是由于强调以粮为纲，集体副业和家庭副业都受到了限制，加上管理上强调统一指挥而不考虑各地区的差别，即所谓“一刀切”，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所谓“吃大锅饭”，农村经济进入了停滞状态。以开弦弓村来说，1966年到1978年的12年中，粮食总产平均递增率是3.95%，不到大动乱前的一半。由于单打一抓粮食，忽视了工、副业生产，且粮食生产上忽视了节约成本开支的重要性，加上人口增长，个人平均年收入一直徘徊在114元上下，也就是停在1966年的水平上。

这次全国大动乱在农村中的消极影响到1978年年底才得到全面纠正，中国的农村经济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我继续讲到这几年在开弦弓村见到新气象和新问题之前，我想插进一段讲一讲影响着农村经济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它就是人口问题。

从1949年解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显著的改善，而同时人口也有较快的增长。1917年，中国人口有4.4亿人，32年后（1949年）人口增加了1亿，达5.4亿。又经

过了 32 年，1980 年年末估计中国人口已近 10 亿，约占世界人口的 22%，在这段时期里，中国人口增加了 81%，每年平均增长 19%。这样巨大的人口，分布又极不均匀，90% 以上分布在中国的东南，东南一半的人口密度 10 倍于西北半部，其中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每平方公里平均有 400—500 人，是世界人口最密集地区之一。

开弦弓村就在这人口最密集地区。我在 1936 年得到当时这个村子的人口数字是 1 458 人，格迪斯教授得到 1956 年的数字是 1 440 人。虽则由于该村行政地区划分略有改变，在比较人口数字时还需要加以校正，但已有的数字可以说明在这一段时间里，开弦弓村在抗战时期可能由于战争的影响人口有所下降，而且解放后在全国人口开始暴涨的最初 8 年（1954 年到 1957 年全国出现第一次人口高潮，每年平均增长 21%），开弦弓村人口却比较稳定。我至今还没有找到 1957 年到 1965 年这段时期的人口资料，而这正是它的人口开始上升的时节。1966 年开弦弓村人口已达到 1 899 人，比 1956 年增加 459 人，即 31.9%，增加率甚至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数，出现了人口暴涨。

对于开弦弓村这个特殊现象的解释还有待于今后的研究。但是现在可以提到的是，我在上述书中已经讲过的，这个村子的农民长期以来存在着人口控制的习惯。我在这次访问中曾追问他们为什么后来抛弃了这个习惯而让人口暴涨呢？他们给我的解释首先是政府禁止溺婴，所以儿童多了，后来群众有了节制生育的医学方法之后，儿童还是比较少。这种解释是否可靠还待调查。但是这表明这个村的农民并没有改变对人口需要控制的传统观念。

当前开弦弓村的人口是 2 308 人，和 1936 年或 1956 年相比，只增加约 60%，和全国在相同时间里的增加率相比应当说是比较低的。在这个增加率中除了出生数增加外，还有死亡数降低的一方面。这方面在我这次访问中印象很深，不仅是我还能找到许多 30 年代相识的老乡，而且从人口资料中看到在 70 岁以上的人数，1936 年是 17 人，而现在却有 114 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卫生事业的改

善，改变了过去多生多死的控制人口的公式。在早就意识到人口压力的开弦弓村，用科学方法进行的计划生育正符合人民的需要，这使得这村的干部在答复我问到最近落实计划生育政策的情形时，很有把握地说：“这在我们这里是没有多大困难的。”人口统计也证实了这一点，自从 1977 年以后不仅增长率已经降低，而且已出现过负号的年头。

我不敢说在开弦弓村所见到的人口现象在全中国有多大的代表性。从已有的资料看来，开弦弓村历年人口的变化和中国全部的人口变化两者之间的差距是相当大的。但是即使以开弦弓村的情况来看，中国的人口压力已经够严重的了。在一个发展中国家，从个体经济进入集体经济的过程中，由于社会安定，生活有了保障，人口激增如果不及早预防是不容易避免的。

人口增长过快，影响了个人平均占有农产品的数量。尽管解放以来，我国农业生产有相当大的增长，它的增长速度也超过人口增长的速度，但是由于人口毕竟增长得过多，个人平均粮食配额就不容易提高。例如 1978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 6 000 多亿斤，比 1949 年增长了 169.2%，但按人口平均，仅增长 52%。经过解放以来的 30 多年，到 1980 年，中国谷类的个人平均配额仅约有 580 斤，即 290 公斤。一部分农业落后地区还不能自己解决粮食问题。然而，开弦弓村由于土地相对肥沃，人口相对增加得慢一些，情况就显然不同。1962 年已实现了“三餐干饭”，1980 年个人平均实际得到的粮食（包括口粮及副业的粮食津贴）已接近 1 000 斤，即 500 公斤，除了自己充饥之外，已有余粮喂养猪、鸡等家畜，提高了家庭收入。从这个小窗户里去看全国形势，且不论人口压力对教育和就业的影响，单是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控制人口的必要性也是很显然的。

然而，无论我们现在采取任何有效办法来控制人口，以全国来说，10 亿人口这个数目绝不容易在短时期内有所减少。据最乐观的估计，到 20 世纪末，中国人口将达到 12 亿。此后，如果政策对头，也许可以开始稳定和下降。现在这 10 亿人口中有 80% 住在农村里。因此，

我们必须从这个基本事实出发来考虑今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回想起我自己对中国农村问题的认识,《江村经济》确是一个重要的起点。在这本书里我注意到中国农村里农业、家庭副业、乡村工业的关系。我的姊姊用了她一生的岁月想通过改进农村里的副业和工业,来帮助农民提高他们的生活。1938年我从伦敦回国,在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云南省的内地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使我进一步看到在一个人口众多、土地有限的国家里,要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重点应当放在发展乡村工业上。我在《乡土中国》(*Earthbound China*)一书里明确地提出了这个见解。1957年我重访江村,看到当时农业上有了发展,我感到高兴,但是为那种忽视副业和没有恢复乡村工业的情况而忧心忡忡。现在,历史的事实已经证明我当时的忧虑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这次短短几天的访问,激动人心的巨大进步以及令人陶醉的家乡情谊,使我担心我的观察是否会超越了科学的界限。中国有句谚语,“旁观者清”,我高兴地知道在我回乡前大约10天,亲自到开弦弓村观察的冈萨勒斯教授将有机会用她所观察的事实来讲述她的见解。但是我也不愿意错过这个机会,把我在这次访问中得到的一些看法,在这里传达给关心中国农民生活的朋友们。

我在这个讲演开始说明开弦弓村在全国的地位时,已经说过1980年这个农村个人全年平均收入已接近300元,位于全国的前列,大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所以它在中国可以称作属于富裕的一类。但是开弦弓村达到这个水平还只有3年。3年前,1978年个人平均收入还只有114元。为什么在这几年里这个村子的农民会这样富裕了起来呢?

开弦弓村农民收入的增加主要是由于1979年以来贯彻了党的三中全会决定的政策,改变了农村经济的结构。那就是纠正了片面地发展粮食生产,而落实了多种经济的方针,大力发展多种多样的副业,不仅包括已纳入集体经济的养蚕业,而且扩大了各种家庭副业。我在30年代见到的养羊和50年代见到的养兔,现在已成了家家户

户经营的副业，并且已是家庭收入的重要部分。以养兔为例，养一只长毛兔，每年可以出售兔毛收入10元以上。而很多人家养5~6只甚至10只以上。全社一共养兔10万只，一年总收入超过100万元。各种家庭副业合在一起，个人平均收入1980年为120~150元，占个人平均总收入的一半。

开弦弓村有一家，共3人，1980年出售肉猪9头，养羊2只，养兔8只，加上卖给集体的肥料和自留地所种的能出售的油菜籽等，一年得到1087元，他们从集体劳动工分（包括农业和集体副业）收入660元，每人平均收入是582.3元。这一家在开弦弓村还并不是突出富裕的人家。另一家，共5人，其中4个劳动力，1980年收入2429元，人均485.8元。这家全年日常生活费用是960元，储蓄1469元，预备添盖房屋。

开弦弓村的老乡一致同意，吃和穿，也即温饱，已经不成问题。现在主要的问题是住，也即房屋和家具。冈萨勒斯教授能用她在农民家亲自吃过的伙食来说出他们的水平。她会告诉你们所尝到的使她称赏不已的饭菜并不是特地为她的访问而准备的。她常常在人家家里谈话到了吃饭的时候，主人按当地的习惯一定要留客共餐，那就可以吃到日常的饭菜了。

至于穿着，已经超过了保温的要求，对于年轻人来说，时兴的式样成了主要的考虑。手表对他们计时的用处可能还不及装饰的功能；上一代的手镯已经让位给上海牌的手表了。在这一方面还是让冈萨勒斯教授所摄的相片来替我说话更为生动。

冈萨勒斯教授的相片也会告诉我们，我上述书中所附相片上的一些房屋至今还在，只是更陈旧了一些。人口增加60%而房屋的增建却远远落后。该村干部提供给我们关于住房的数字，从1948年到1980年每人平均只增加0.04间，每间约20平方米，所以每人平均增加不到1平方米，全村增建一共不到100间。我参观了一个生产队，10多家，挤在3个大门内，在30年代这里只住3家人。建筑房屋的困难，比如土地少，建筑材料不容易买得到等，我不在这里多

说。要说的是这个村子的老乡手边有钱能想到建筑房屋，还是近年来的事。造一间房要 1 000 元，一家至少要三间。在 1978 年前有多少农民的积蓄能达到 3 000 多元呢？而这几年来，情况变了，农民现金收入多了，一年上千元的储蓄已经不稀奇。这些钱怎样花呢？绝大多数农民的答案是居住更新。

这次访问中特别引起我兴趣的是农村中居住更新的过程一般是通过青年一代结婚的机会进行的。新婚夫妇需要单独的卧室。在房屋紧张的情况下，不是延期结婚，就是得把老房间分隔。在开弦弓村老一代中确有一生娶不起老婆的人。这几年农民具备了盖新房屋的经济条件时，凡是有儿子要结婚的就急于要扩建住所。过去一年中，靠河边大约有 250 户人家的几个生产队一共建造了 50 间新房子，几乎全是扩建旧宅的性质。因之，这个村子房屋的布局更见凌乱。新建房屋内床柜箱桌等用具也是大多在结婚过程中添置的。从订婚到结婚这段时间里，男女双方的家长忙于张罗。由于开弦弓村是父系父居社会，所以提供房屋是男方的责任。那些无力提供房屋的男方，也有采取入赘方式，住到女方提供的房屋里去的。新房内的用具事实上是男女双方合凑的，比例以女方经济水平决定。名义上，男方要给女方一笔礼金，而这一笔礼金实际上是给女方准备嫁妆的津贴。这几年经济好转后，女方提供的嫁妆，一般说来都超过礼金所能购买的东西。我们曾参观过一家新房，凡是女方提供的嫁妆上都挂着一条红色丝线，所以很容易看出男女双方贡献的比例。在这间新房里，双方的贡献几乎相等。我们得到的解释是这个地区女儿少，特别受疼爱，所以出嫁时总是要尽力准备一份丰盛的嫁妆。我们当场估计了一下全部用具和衣服的总值达 2 000 多元。这个数字曾经引起结婚费用太高的批评。过于讲究排场固然不好，但是也应当看到事实上这正是农村里生活资料更新的重要过程。至于为了取得对男女间新的夫妇关系的社会承认而采取宴请亲友的方式，由于传统的好客风尚，有时未免花费得过分一些，那也可以说这是当前流入农村的货币缺乏其他轻工业品去吸收回笼的一种结果。